

杰姆逊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

梁 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梁 苗(1981-), 女, 河南南阳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

[摘 要]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及产生的影响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但国内外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却存在着诸多分歧。杰姆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所作的细致考察虽有偏颇, 但却有其自身特色和价值。他不仅从概念上将“后现代主义”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而且从细节上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和连续性作了具体分析, 从而表明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马克思主义; 文化

[中图分类号] B7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3-0297-06

一、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早期关注

《后现代主义, 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分析后现代主义中最系统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但正如肖恩·霍默(Sean Homer)指出的, 该著作是由杰姆逊先前的两篇论文糅合而成的, 即“理论的政治: 后现代论争的意识形态立场”和“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据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称, 前文写于1982年春, 后来发表于1983年《新德国批评》, 它勾画出了各种后现代理论的关系图, 杰姆逊在吸收这些理论的同时也以一种综合的形式进入了后现代领域; 后文最初是杰姆逊1982年秋在韦特尼博物馆的演讲稿, 后经扩展发表于1984年的《新左派评论》, 书中提出了杰姆逊理论的核心问题, 即现代主义的过去和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现的新形式的后现代主义的到来。不仅如此, 安德森还认为, 这一颇具创见的思想一直贯穿于杰姆逊后来的著作中, 构成了杰姆逊所有著作的基石^[1] (前言第1-2页)。

因此, 一般认为, 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最早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杰姆逊自身的理论轨迹看, 情形似乎也正是如此。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 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可以追溯到他在1975年发表的长文《文本的意识形态》, 而按照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贝斯特(Steven Best)的观点, 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了, 因为“在杰姆逊70年代的文本中就已有几处重要的地方预示了他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2] (第19页)。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序言中, 杰姆逊就已经注意到了“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的新方式”及其带来的新文化形式, 认为在所谓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尤其是在美国, 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 比如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 传播媒介及广告工业的急剧扩张等, 它们使文化作为商品进行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而事实还不仅如此, 杰姆逊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变化还带来

了人们在经验方式上的变化: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封闭于丰裕社会的壁垒和禁锢之内,越来越离开这个世界上生产与劳动的现实,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服务性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景观社会,以致人们“居住在一个由人工刺激和电视传播的经验所构成的梦幻世界里”,而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存在和生命意义的基本问题,“从来没有显得这么极为模糊和不切题旨”^[3](序言第8页)。

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中,杰姆逊进而指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应该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进行,因为有关后现代的理论是建立于一个更根本和阶段化的、对作为系统与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假设。根据这一经济与社会的假设,资本已经经历了三次特定的变异,在此过程中,经济基础的持续性与完整性是通过几个扩张的阶段(对资本的安排组织方面的量变)来维持的,这看起来也像是几次断裂,仿佛在文化与上层建筑中也出现了崭新的现实存在的文化逻辑。杰姆逊认为,“这三个阶段即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阶段(由列宁所阐述的),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全球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这最后一种形式尚未有足以胜任的名称,但却是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其开创性的著作《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中颇具雄心的理论的目标”^[4](第138页)。

由此我们看到,将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最早关注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也无可厚非。但是,杰姆逊本人的理论轨迹却透露了更具有说服力的信息。杰姆逊于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早期一直都致力于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人物的思想,并潜心建构自身理论的方法论框架,这一工作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初具规模,而1981年出版的《政治无意识》则标志着这一工作的完成。对此,凯尔纳也是承认的,并且认为杰姆逊至少在《政治无意识》之前(包括《政治无意识》)还停留于“现代主义”,《政治无意识》“虽敲响了现时之门却并未跨过现时之门槛”^[5](第19页)。因此,我们认为,截止到《政治无意识》,杰姆逊的理论重心还是现代主义文学,还未转向对“后现代主义”的专门研究。

但即使这样,杰姆逊早期谈及后现代主义的只言片语,没有展开充分论证,却已经切中了后现代主义的要害,即研究“后现代主义”必须紧密关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也是顺其自然地进入了后现代的文化场景之中。所以,《政治无意识》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点。

二、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

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首次作出比较详尽的正面论述是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作为比较文学专业出身的杰姆逊,他所关注的后现代主义当然包含着相当具体的文学内容,但在杰姆逊这里,“后现代主义”这一新名词不只是用来描述某一个阶段文学作品的风格,而且还可视为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格和文化逻辑,因为文学这个封闭的领域恰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缩影,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微观世界。虽然杰姆逊指出,并不是今天所有的文化生产都可以用“后现代”来概括,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也还存在,但是,西方文化在50年代末出现的“断裂”已经足以使现代主义文化退居后台,一种异于现代时期的文化突显为一种新的文化主导因素。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杰姆逊接着指出,“后现代主义”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其作用是把文化上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谓的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cle)社会,或跨国的资本主义”^[6](第399页),亦称晚期资本主义。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这个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所以它应该能够表现出新近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内在真相的若干方面,它的形式特点在很多方面也应该能够表现出那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因此,杰姆逊的意图就是探索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以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逻辑呈现于社会生活中的。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杰姆逊进一步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变化及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分析。在对当前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杰姆逊反对贝尔

(Daniel Bell)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的提法,而赞同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杰姆逊认为,贝尔的提法试图“证明当今的社会组织和构成已经不再依循传统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也就是说,不再以工业生产为其发展的主导推动力量,更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统摄社会生活的总体方式了”^[4](第425页),所以明显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相比于贝尔这种明显维护资本主义的言论,杰姆逊认为,第四国际经济学家曼德尔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更有可信性。我们知道,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入手,并按照自己的长波理论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化,并且依据“机器生产的发展”构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即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当前所谓的消费社会才是资本主义最纯粹的形式。杰姆逊受曼德尔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具体来说可归为两点:一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方面杰姆逊认为,曼德尔的分析并未偏离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分析,而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当前阶段进行理论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不同于曼德尔对技术的倚重,杰姆逊认为“科技是资本发展的成果而非成因,要探讨科技革命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就得从资本发展的各个阶段说起”^[4](第483页),从而将资本的逻辑作为自己分析“后现代主义”这一历史现象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点。二是对于资本主义分期的认识。根据资本扩张的逻辑,杰姆逊一方面反对将资本主义的现阶段称为“后工业阶段”,而是主张客观地称之为“跨国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的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杰姆逊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分期理论,即对应于资本扩张的三个阶段即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也存在着三种相应的文化形式,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由此,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扩张具有紧密联系。资本的扩张和渗透是无形的,但对于文化的变化,人们却可以在经验的层面上感受到。在杰姆逊看来,现代时期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文化已成为“刻板无生气的经典巨著”,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们像梦魇似的压在活人的心头。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中“文化”这个范畴本身所显示的种种剧变,足以使人们用另一个术语来指称,这个术语就是“后现代主义”。相比于现代时期的反叛文化,“后现代文化在表达形式上的艰深晦涩、在性欲描写上的夸张渲染、在心理刻画上的肮脏鄙俗、以至于在发泄对社会、对政治的不满时所持的那种明目张胆、单刀直入的态度——凡斯种种,超越了现代主义在其巅峰时期所展示的最极端、最反叛、最惊人骇俗的文化特征。总之,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姿态,我们今天的群众不但易于接受,并且乐于把玩,其中的原因,在于后现代的文化整体早已被既存的社会体制所吸纳,跟当前西方世界的正统文化融成一体了”^[4](第429页)。

杰姆逊认为,这个“既存的社会体制”就是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就是说,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人们不断生产日新月异的产品,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收回,并且把利润不断地翻新下去。在这种体制中,文化的生产愈来愈受到资本逻辑的规范,文化的逻辑被资本的逻辑吸收并且被纳入“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基本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因此,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恰恰反映了这种文化角色和功能的改变,并且作为资本对文化彻底渗透和同化的标志而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文化的逻辑被资本的逻辑所吸收,并成为资本继续扩张和渗透的工具,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杰姆逊的这一创见使他在后现代主义这一研究领域成为不可忽视的人物。

三、关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和连续

文化固然有其自律性,但资本扩张的连续性和阶段性却也现实存在地反映在文化自身的变迁之中。虽然有学者指责杰姆逊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资本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分析中有机械决定论的嫌疑,但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杰姆逊已经意识到,资本与文化的边界在日益模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文化的资本化和资本的 culturalization,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它表现为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和连续性。

一方面,杰姆逊认为,“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4](第421页)。

在《为60年代分期》(Periodizing the 60s)一文中,杰姆逊从经济、哲学史、文化生产、革命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四个层面对60年代及其标志的时代断裂进行了具体分析,详细地揭示了历史时代的变迁。在经济层面上,由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所以“60年代常常被想象成资本和第一世界列强在全球大撤退这样一个时期”,但杰姆逊认为,从事后的观点看,将60年代“构想成资本进入了一个鼎盛、能动、并且创新的时期,一个配备了整套崭新的生产技术和新型‘生产工具’的时期”^[5](第186页)也许更为合适。因为从60年代的现实发展来看,“第三世界”在新的跨国资本主义的渗透下开始经济上的转型,“第一世界”则开始呈现出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景观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迹象,在文化上则是“后现代主义”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出现。换言之,在60年代时期,自古典资本主义中幸存下来的自然的最后遗迹被最终消除,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前者标志着农业的被迫资本化、农民的被迫无产阶级化以及相关的传统农业文化的消失,后者标志着文化的被迫资本化以及文化的独立自主性逐步被资本的逻辑同化。因此,“60年代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其中,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重组在全球范围内展开”^[6](第207页),这标志着资本的扩张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因其扩张的深度和广度与先前阶段的扩张明显不同而表明了一个新的时代。在哲学史的层面上,杰姆逊指出,时代的变迁体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理论”对“哲学”的逐步取代上。一方面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取代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反马克思主义(Anti-Marxism)及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取代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哲学话语上的差异性对抗总体性、不确定性代替确定性、小型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精神分裂分析取代精神分析、身份政治替代总体政治等等。杰姆逊认为,哲学消融于理论的过程,既是资本渗透的结果,也说明哲学自身的危机已经出现。在杰姆逊看来,萨特作为传统哲学体系的最后一位建筑大师,标志着现代哲学的结束。在文化层面上,正如杰姆逊上面指出的,文化被资本殖民,先前作为一个自律领域与资本对峙的文化被资本的逻辑同化,文化生产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生产总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本身“落入尘世”,并全面“移入”社会生活,在尘世间“惊人地扩散”。但这种“移入”并没有提升文化也没有提升生活,反倒是因为资本的均质化而造成了文化自身的黯然失色和平面化,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平面化、标准化和索然无趣。杰姆逊认为,文化的这种惊人扩散和日趋平面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显著的文化特征。对这种文化的政治反抗,最集中地表现在60年代末期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运动中。但是,杰姆逊认为,这些运动不仅体现了时代的断裂,而且加强了时代的断裂,因为政治运动不仅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还有效这样的问题,更是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形式和压迫形式的分散化与多样化,从而使人们猛然意识到“身份政治”时代的来临。

因此,总括起来,杰姆逊认为,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历史已经出现了某种断裂,某些崭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出现,标志着人们需要新的思考方式和理论话语对之进行分析。

但是,杰姆逊并不像其他分析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那样,只看到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断裂,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连续性,而是主张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应该实事求是地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杰姆逊认为,后现代断裂的出现不代表人们与之之前的现代时期变得毫无关联。换言之,断裂中有继承,崭新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凭空出世的;现代主义也绝不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地点戛然而止,在历史的长河中倏然消失。因此,对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个时期之间的断裂与连续性的问题,杰姆逊说:“我必须把我的答案限制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即两个时期之间的截然断裂一般并不关系到内容的完全改变,而只是某些元素的重组:在较早的时期或体系里是从属的特点现在成了主导,而曾经是主导的成了次要。”^[4](第416页)贝斯特和凯尔纳曾针对杰姆逊的这种观点说,“我们反对那种天启式的后现代主义概念和后现代性概念,而赞同杰姆逊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凭空产生的绝对变化,而是‘从子宫中’从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母体中诞生出来的”^[6](第357页)。

四、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及评价

关于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这一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

杰姆逊被西方学者普遍誉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一称谓并非专指杰姆逊一人,而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產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7](第5页)。除了杰姆逊研究的作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之历史现实基础的跨国资本主义,还有德里克所指认的“弹性生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哈特的“活体生产”中的帝国政治,以及哈维的福特主义之后的“灵活积累体制”,他们所共同坚守的都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

对于他们这群“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界定,国内外学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分歧。贝斯特和凯尔纳将他们与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德勒兹等人放在一起,统称为后现代主义者,他们说,“我们将用‘后现代主义者(postmodernist)’一词来称谓哲学、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领域中的后现代倡导者”^[9](第38页),并将所有这些人的理论统称为“后现代理论”。但是这种划定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错误。不可否认,杰姆逊的思想来源非常复杂,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也非常有权威性,但是无论如何,谈论、研究“后现代主义”与赞同、提倡“后现代主义”绝非一回事,把两者不加分析地等同起来,结果是免不了造成一种对杰姆逊的重大误读。其实,自涉足后现代主义论争开始,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就始终抱着清醒、冷静、客观的批判态度,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将后现代主义置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予以分析,并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的各种观点来重新思考当前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这些基本的立场和观点显示,将杰姆逊与福柯、鲍德里亚、利奥塔等人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合适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不少人也把杰姆逊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布道者。

不同于凯尔纳和贝斯特的观点及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张一兵等学者将杰姆逊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称为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并将其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直接继承人。晚期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和根本观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因此他们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明显不同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不同于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者。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明里赞同马克思主义,暗里却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否定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后马克思思潮则是明目张胆地赞扬断裂,宣称人们已经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以鲍德里亚、德勒兹、晚期的德里达,以及目前当红的波斯特和齐泽克为代表,他们是后现代思潮的领军人物。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杰姆逊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显然属于冷静、客观的分析态度,因为他并没有盲目地歌颂、或者贬损后现代主义,而是冷静、客观地在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基础上,从资本的角度准确地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尽管杰姆逊本人可能不太同意“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称谓,但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和判断中,却表明其思想实质是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思想原则的。

而事实上,杰姆逊本人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也已经标明了他自己的态度。杰姆逊在多处强调,对于“后现代主义”这一历史现象的任何思考,都必须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对之进行历史的考察,必须时刻警惕这种历史的考察沦为一种道德性的评估而成为资本同化的牺牲品。在杰姆逊看来,原本是历史性的理解如果沦为一种道德性的评价,必然无法从历史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准确的认识 and 定位。因此,杰姆逊提醒研究者说,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分析,人们应该避免两种论调:一是以放纵的姿态一窝蜂地拥护后现代主义;二是一味以道德标准斥责后现代主义。依杰姆逊之见,这两种论调都没有跳出晚期资本主义资本扩张的逻辑,按照张一兵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恰恰就是晚期资本主义运作之无意识的象征化同谋”。

因此,在杰姆逊看来,更值得肯定的做法是,应该将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重组及与之

相连的文化上的全面更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亦即应该将后现代主义置于更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之中进行考察。杰姆逊正是这样做的,虽然他的理论庞杂不堪,又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痕迹,但他高度的整合力和现实感使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思索在当今世界思想界有着重要的影响。说实话,杰姆逊给我们提供的,不可能是一整套完美的解决方案,而毋宁说是诸多思考中的视角之一。鉴于此,我们从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启示或许就是其思想的价值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文化转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2] Kellner, Douglas. Postmodernism-Jameson-Critique[M]. Washington, D. C. : M aisonneuve Press, 1989.
- [3]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7.
- [4] [美]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5] Jameson, Fredric. Periodizing the 60's[J]. Social Text, No. 9/10,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Spring-Summer, 1984).
- [6] [美] 贝斯特, 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 [7] 张一兵. 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5).

(责任编辑 严 真)

Postmodernism in Jameson's View

LIANG Miao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ANG Miao (1981-), female, Doct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ah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It has become the undoubted fact that Postmodernism emerged and produc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but there has been no accordant opinions on it. Although partial somewhat, it is very peculiar and valuable that Jameson defines "postmodernism" as a new cultural logic which corresponds to a new stage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He not only interprets clearly the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 but also analyzes the break and continuity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modernism concretely, which explains postmodernism properly as a whole.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Marxism; culture